

激進與保守的迷惑

• 許紀霖

兩個不同層面的激進或保守

關於對討論中的核心概念「保守主義」的界定，姜、余二位並未有原則的分歧，只是余先生以通俗簡化的說法將之定位在「要求變革較少」上，姜先生則更學理性地闡述為「要求使變革範圍於特定的價值取向之內，範圍於尊重傳統、尊重權威、民族主義等範圍之內」。這些界定在一般意義上都是有效的，可以用來描述思想史上總的價值取向。不過我認為，當我們將「保守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用來具體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各個層面的現象時，必須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嚴格分開，因為它們各自所憑借的座標是不同的。所謂文化層面的激進或保守，主要取決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取向，主張全盤推倒的是為激進，而文化闡釋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內的是為保守。所謂政治層面的激進或保守，主要看其對現實社會政治秩序的

認同態度，要求根本解決、推倒重建一個新的是為激進，主張在現存系統內作技術性調整和修補的是為保守。

以此觀之，就可以發現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中，文化與政治層面的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呈現出較為複雜的交叉關係。如果說在晚清傳統的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大致同構，文化上的保守或激進也導致相應的現實政治取向的話，那麼民國之後由於先後建立的各種政治秩序，無論是北洋的軍閥政治，國民黨的黨治國家模式，還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都與傳統文化價值發生了相當的疏離，因此文化上的全盤反傳統不一定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比如胡適是眾所公認的文化激進主義思想領袖，但他的政治取向卻是相當溫和的，在40年代後半葉甚至一度還趨於保守^①。同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也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文化上的全盤反傳統。孫中山的政治綱領在清末民初可謂是最激進的，但他對中國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哲

將「保守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用來具體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各個層面的現象時，必須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嚴格分開。

文化上的全盤反傳統不一定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也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文化上的全盤反傳統。

學卻十分推重，直到「五四」之後的20年代還是認為修齊治平這一套理論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忠孝仁義這些「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也應該「先恢復起來」^②。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再舉出一些。這說明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的激進主義同保守主義並非那麼對應，其關係錯綜複雜。政治保守主義可以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找到它的思想資源，政治激進主義也同樣可以在本土文化中獲得它的支援意識，因為中國文化傳統本身就是多元的，具有多重的價值取向，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其中的不同部分加以重新闡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其實是同一種思維邏輯的不同面貌而已。



釋，就會成為保守或激進的意識形態。

文化激進主義的幾度興衰

余英時先生在分析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導價值取向時，斷定它是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這在一般籠統意義上是成立的。不過，深入到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層面，有些分析似乎還應該更細緻一些。

就文化層面而言，從清末到「五四」確實是一個連續激進化的思想歷程，中國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從器物、政治觀念直到倫理價值，由表及裏地受到了時代的挑戰，到新文化運動時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將文化激進主義推向了顛峰。不過，我們也應該同樣注意到，激進思想顛峰過後，從20、30年代起中國思想界峰迴路轉，主導價值取向開始趨於溫和化。要求西化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激進的過程中遇上了幾乎是難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誠仿效西方與發現西學「破產」的困惑，第二是全盤實現西化與西學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與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後是拯救民族危機與文化出現「真空」的困惑^③。在此思想和心理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試圖在融和本土與外來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實現文化的重建。在30年代中期的中國本位文化討論中，繼續主張「全盤西化」（陳序經）或「充分世界化」（胡適）的激烈聲音轉為微弱，相反，「不守舊，不盲從」，「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④這類「中國本位」主張卻得到了大部分討論者的認同。

不久，北平左翼文化界發起的「新啟蒙運動」，也檢討了「五四」的偏激，認為「不應該只是毀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接受外來西洋文化」，未來的新文化「乃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⑤。正是在知識界激進勢頭減弱、本土意識崛起的思想背景下，才有了40年代中國思想價值的某種顯著轉向：在延安馬列主義與民俗文化相結合，本土化為毛澤東思想；在重慶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以「唯生論」、「力行哲學」的形式也趨向保守；在學術領域新儒學的第一代學者也構建起自己的理論框架。各種方式的文化回歸主宰着40、5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直到60年代海峽兩岸分別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文化底蘊再度刮起全盤反傳統旋風，以後台灣到70年代本土意識重新抬頭，大陸在80年代則演化為另外一種方式的激進主義浪潮，直到近兩年方轉為弱勢。縱觀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文化面的時風變遷，激進主義並非統領天下風騷，而是經過了兩次周期性的興衰。

強勢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政治層面，轉向社會變革的意識形態領域，在進化論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棄傳統的懷古情結，以往而不返的進步精神，一再摧毀現存社會政治秩序，追求唯理主義的烏托邦境界。

不過，在描述這一激烈變革的過程中，僅僅用激進或保守加以價值取向的定位，會遭遇一些語義上的困惑。近代中國總是處於新舊交替的變局之中，制度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

接；從滿清王朝政治到北洋軍閥政治，再到國民黨的黨國政治、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最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重新鑄造國家機器，其間隔時間在17-25年之間，平均二十年左右就有一次「翻天覆地」的結構性巨變。由於秩序更替過於頻繁，界定激進與保守的座標也因此令人捉摸不定，往往今天還稱得上激進派，明天就被斥責為保守派。事實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的保守派幾乎無不具有激進主義的早產背景，因為形成他們政治保守的既得利益正是當年他們通過激進的方式「打江山、奪江山」得來的。

我以為，在分析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價值取向時，與其用激進與保守這類語義含混、所指滑動的概念，不如借助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的兩種社會改造工程分析模型更清晰一些：即是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 social engineering)和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二十世紀中國的癥結恰恰在於，那種整體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烏托邦改造工程太強大了，主宰了整個中國思想界和社會政治實踐，以致於自由主義的漸進改造工程完全失卻了對它的制衡能力，使得中國的變革就如走馬燈一般，你方唱罷我登場，方式一個比一個愈極端激進，目標一個比一個更浪漫空渺，到頭來發現歷史只不過經歷了一次次可怕的輪迴，仍然滯留在最初的起點上！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 都太強大了

激進主義固然屬於烏托邦改造工

在知識界激進勢頭減弱、本土意識崛起的思想背景下，40年代中國思想價值顯著轉向：在延安馬列主義與民俗文化相結合，本土化為毛澤東思想；在重慶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以「唯生論」、「力行哲學」的形式也趨向保守；在學術領域新儒學的第一代學者也構建起自己的理論框架。

近代中國平均二十年左右就有一次「翻天覆地」的結構性巨變，由於秩序更替過於頻繁，界定激進與保守的座標也因此令人捉摸不定，往往今天還稱得上激進派，明天就被斥責為保守派。

激進主義固然屬於烏托邦改造工程，但在二十世紀中國，保守主義也具有同樣的思想行動特徵。

程，但在二十世紀中國，保守主義也具有同樣的思想行動特徵。激進與保守表面上看似乎是勢不兩立，水火難容，實際上它們是一個分幣的兩面，在深層具有共通的思想預設和思維邏輯。中國的保守主義在文化層面上與激進主義一樣具有一元論的思想性格，將傳統與現代置於價值天平的兩端，只不過取向相反；在學術文化討論中充滿意識形態偏見，混淆事實與價值兩重世界，缺乏開放、寬容的學術態度和多元價值取向，偏好以唯理主義或唯美主義的思維方式一廂情願地營造民族文化的烏托邦。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保守主義更具有激進主義的諸般特徵，迷信政治國家的可能，壟斷一切社會資源和權力資源，以整體主義來處理社會不同層面的問題；製造某種權威性、自足性的意識形態神話，將子虛烏有的整體利益視為高於一切，拒斥任何來自社會底層的個人慾求，等等。因此之故，保守主義才有可能在同一個層面上與激進主義撕殺個你死我活，不可開交，一旦座標變易，它們之間也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相互轉化，交換角色。

總的來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都太強大了，為了各自的烏托邦目標，兩方面都動用最為激烈的話語和最為極端的手段，鬥得天昏地暗。相形之下，以漸進社會工程為特徵的中國自由主義又實在實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會變革中幾乎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找不到應有的位置。在中國文化辭典中，從來不缺改

朝換代那種激進思想資源，也不缺抱殘守缺式的保守主義傳統；獨缺的是開放的、多元的、漸進的、真正能為現代民主與科學提供思想和現實土壤的自由主義。余英時先生再三致意的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並不是中國保守主義的社會目標，倒是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二十世紀中國究竟多的是甚麼，缺的是甚麼，不是再清楚不過了麼？

註釋

- ① 關於胡適文化與政治思想的複雜性，可參閱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②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4-6講。
- ③ 參見拙文：《近代「融和」中西文化的歷史反思》，《走向未來》雜誌第4期，1988；該文收入拙作：《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 ④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卷1，期4，1935。
- ⑤ 張申府：《五四運動與新啟蒙運動》《讀書商報》第2號，1936。

許紀霖 1957年生於上海，獲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碩士學位，現為上海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保守主義更具有激進主義的諸般特徵，迷信政治國家的可能，壟斷一切社會資源和權力資源，製造某種權威性、自足性的意識形態神話。